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徐崇温 主编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研究

Postmodernism and
Social Inquiry

[美] 戴维·R.肯迪斯 安德烈亚·方坦纳 编

周晓亮 杨深 程志民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徐崇温 主编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研究

Postmodernism and
Social Inquiry

[美] 戴维·R.肯迪斯 安德烈亚·方坦纳 编

周晓亮 杨深 程志民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David R. Dickens and Andrea Fontana: **Postmodernism and Social Inquiry**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first edition 1994 of English Language
Copyright © 1994 by The Guilford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原出版社 Guilford Press 授权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在中國大陸地区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04)第4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研究 / [美] 迪肯斯, [美] 方坦纳编;
周晓亮, 杨深, 程志民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6.5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ISBN 7-5366-7736-7

I. 后... II. ①迪... ②方... ③周... ④杨...
⑤程... III. 后现代主义—社会学—研究 IV.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5435 号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研究

HOUXIANDAIZHUYI YU SHEHUI YANJIU

[美] 戴维·R. 迪肯斯

安德烈亚·方坦纳 编

周晓亮 杨 深 程志民 译

出 版 人: 罗小卫 丛书策划: 陈兴芜

责任编辑: 杨亚平 责任校对: 何建云

封面设计: 金乔楠 版式设计: 刘忠凤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图文制作部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1 字数: 272 千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37.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 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

——为《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

徐崇温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无论是凯旋进军，还是遭遇挫折，都在相当程度上同是否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有关。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的问题，直截了当地回答说：“社会主义一定要体现出优越于资本主义。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一点，就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努力的标志就是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速度。”（《邓小平思想年谱 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9 页）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序列上，社会主义是一种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本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为什么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体现出这种优越性呢？就客观原因来说，这主要是因为 20 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而是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还是一种“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而就主观原因来说，则主要是因为没有正确理解社会主义，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因而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和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贯思想。在19世纪70~80年代,马克思认为在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国家的帮助下,像俄国这样拥有农村公社的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可以越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但是,他又再三再四地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1~435页)。

列宁更把吸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看做十月革命以后苏俄建设社会主义过程所面临的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针对“左派共产主义者”把资产阶级当做旧的无用的废物完全抛开的主张,列宁指出:“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52页)他还强调说:“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的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同上引第171页)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列宁又特别致力于破除那种离开了社会结构的总体状况,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抽象对比的观察方法,坚决实行利用资本主义,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虽然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发展,但它毕竟在吸收外国贷款、引进先进技术等许多方面大大加快了经济建设的步伐。在苏联第一、二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一大批利用西方技术和设备的大型企业拔地而起,在苏联以16.8%的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只是从20世纪30年代下半期开始,由于斯大林认为干部、技术问题已经解决,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取得胜利,这才开始收缩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使苏联的对外贸易额从1930年的16.43亿卢布降至1939年的2.7亿卢布,外资企业逐渐被取消,外国技术人员纷纷回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又压缩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的经济联系,斯大林还在1952年提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认为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瓦解,在两个相互对立的、平行的世界市场中,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己还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斯大林文选》下册,第595页)。这就割断了社会主义国家同世界资本主义的联系,把自己封闭起来,从而使苏联更加陷入关门建设的状态。尔后,这种与资本主义“彻底决裂”的理论和实践逐渐成了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到了我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更把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正常贸易叫做“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正是这种自我封闭状态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大大地拉大了我国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科技方面的差距,后来,又成为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陷于解体的一个经济上的根源。

在总结这些历史经验的时候,邓小平从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主题的新的时代高度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而要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首先就要了解资本主义、特别是要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在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适应于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了一系列的自我调整:在生产方面,它借助于新的科技革命,把高新技术引进生产,使经济获得比较快速的发展。如果说,资本主义在19世纪创造了有史以来人类生产力的总和的话,那么,从20世纪中期以来,它又创造了超过它自身在以前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它在归资本家私有的企业中推行所有和管理分离以及“雇员持股计划”却又实现有效控股;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它发展形形色色的工人参与决策和管理的制度,缓和劳资之间

的冲突；在消费品的分配和再分配方面，它广泛推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福利国家”，缓解不断扩大的贫富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在上层建筑方面，它建立系统的国家干预机制，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内构成一个争执、协商和妥协的结构，调节社会矛盾，避免社会爆炸。应当说，在这种变化的背后，资本主义的本质依旧，但面目已非。尽管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这种调整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范围内进行的，它并没有解决同不断发展的生产社会化之间的基本矛盾，相反地，这个矛盾还在新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和加深着；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一系列调整举措，又毕竟缓和了社会矛盾，保证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继续发展。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曾就苏维埃政权应该怎样看待和对待资本主义当时的最新成就泰罗制问题指出：“它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操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列宁选集》第3卷，第3版，第491~492页）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行的上述一系列新的调整举措也应当这样看，这里面，除了包含有我们需要摒弃的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伎俩和手段之外，又显然包含有我们需要借鉴和吸取的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办法。

但是，在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并不是一件没有风险的、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是因为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还是世界主题的转换，它们所改变的，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而只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共处和斗争的形式。资本帝国主义始终想消灭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把它们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轨道；过去它主要依靠拿起武器发动侵略战争来达到目的。现在，则主要凭借其在经济、科技上

的领先地位,控制国际市场,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通过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和接触,把它们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强加给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培植起内应力量,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84年出版的《真正的和平》一书中,就明确宣告:“我们的目标应当是使他们(指社会主义国家)参加我们两种制度之间的一场和平竞赛,这种竞赛将会促进他们的制度发生和平演变”,“我们同东方接触越多,就会使它受西方榜样的影响越大。这样做必然会加强那些正在促成演变的内部势力”。除此之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对外开放,也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东西的消极因素,尽管同利用外国资本和科技加速发展带来的积极效果相比,毕竟要小得多,但要是不予正视,不采取针对性的坚决措施而听任其蔓延开来,却会形成严重冲击,贻害无穷,使社会主义变质成为资本主义。所以,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不久,邓小平同志就强调指出:“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而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尊感和民族自信心。”(《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43~144页)而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要求我们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正确地而不是错误地了解当代资本主义。

正是基于这种为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而全面、正确地了解资本主义的需要,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推出这套《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供广大读者研究参考。这套丛书以翻译国外学者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方方面面的论著为主,在适当时候再推出一些我国学者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论著。我坚信,在知己的同时又知彼,将有助于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抓住机遇,又经受考验,从而加快我们的发展,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世界发展格局中掌握主动权,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本书撰稿人

编辑(兼作者):

David R. Dickens: 戴维·R. 迪肯斯, 美国内华达州拉斯韦加斯市内华达大学社会学副教授, 文科研究生课程规划主任。

Andrea Fontana: 安德烈亚·万坦纳, 美国内华达州拉斯韦加斯市内华达大学社会学教授。

序言作者

Fred Dallmayr: 弗雷德·达尔迈尔, 美国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圣母大学政治学教授。

其他作者

David Ashley: 戴维·阿什利, 美国怀俄明州拉勒米市怀俄明大学社会学副教授。

Douglas Kellner: 道格拉斯·凯尔纳, 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得克萨斯大学哲学教授。

Mark Gottdiener: 马克·戈特迪纳,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里弗赛德市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

Norman K. Denzin: 诺曼·K. 登青, 美国伊利诺伊州厄巴纳市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交往、批判与解释理论教授。

Robert Goldman: 罗伯特·戈德曼, 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刘易斯与克拉克学院社会学教授。

Robert J. Antonio: 罗伯特·J.安东尼奥, 美国堪萨斯州劳伦斯市堪萨斯大学社会学教授。

Sondra Farganis: 桑德拉·法加尼斯, 美国纽约新社会研究学院学术事务副院长。

Steven Best: 史蒂文·贝斯特, 美国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市得克萨斯大学人文学科与哲学助理教授。

Steven Papson: 史蒂文·帕普森, 纽约州坎顿市圣劳伦斯大学社会学教授。



序 言

当代理智生活反映的即使不是一种危机感也是一种动荡感。米歇尔·福柯有一次曾写到：“在试图揭示出西方文化的最深地层的过程中，我使它的种种断裂、它的不稳定性和它的流动性重新回归我们那寂静的、貌似静止不动的土地，正是这同一块土地在我们的脚下再一次涌动起来。”这些评语似乎与西方的自由民主在我们时代的胜利凯旋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在许多人眼里，那些与我们竞争的（特别是共产主义的）^①政权的解体标志着现代西方文化及其中心支柱个人主义、科学合理性和技术进步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尽管有这些获胜的夸夸其谈，一种黑格尔的辩证法或“理性的狡狴”似乎将再一次发挥作用。在华丽的甲冑下面，某种空虚感正在蔓延开来，这种怀疑是：个人的同一性逐渐消失，理性主义忽视了也许是颠覆了它的种种前提，进步也并非必然会产生幸福甚至有益于人类生活的条件。在我看来，这种怀疑或不安恰恰处于当代对“后现代主义”——无论这个术语被如何精确地定义或者它的含义被如何具体地表达出来——的种种讨论的核心。

到目前为止，论述后现代主义——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紧张状态——的文献一直倾向于被限制

^①作者在这里把前苏联与共产主义相混同了，这里所指应是前苏联。

——中文版出版者注

在哲学、文学和艺术领域，只有很少的人尝试着探索这些问题与社会科学的相关性。就这一点来说，本书可以成为一个开拓性的努力，担负起在哲学与人文学科之间以及哲学与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之间的鸿沟之上架起一座桥梁的任务。戴维·迪肯斯和安德烈亚·方坦纳汇编了一组论文，这些论文不仅追求并深化了哲学或理论的兴趣，而且以文献的形式，说明了它们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现实实践中的种种反响——包括它们的丰硕成果和它们的局限性，为此应当向他们两人表示祝贺。本书不仅应当受到后现代主义的信奉者的欢迎，也应当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怀疑者和反对者的欢迎。简而言之，《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研究》并不是一部寻求在社会科学中标新立异的“时髦”之作。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的话题一直倾向于在某些领域中引起强烈的情绪，但并非一定是很轻率的。就其格调和主旨两方面而言，本书都成功地抵制和消除了这种倾向。虽然本书的作者们都深深地陷入他们的主题之中，因而不是中立的观察者（遵循实证主义的路线），但他们都采取了一种深思熟虑和批判性反思的态度，因而对社会学研究的优良传统的承传做出了贡献。

迪肯斯和方坦纳的开篇论文巧妙地全书搭建了一个舞台，也为本书之后的未来讨论搭建了舞台。他

们的介绍以一种明白晓畅的文体写成——避免了后现代主义作品常常沾染的那种矫揉造作的行话——并且为后现代主义的那些著名理论公式提供了一个总的概述，同时准确地指出了那些困扰着后现代主义社会学研究方式的显著问题。后面的那些论文追溯了后现代思想的不同的理论先驱，其范围从鲍德里亚和利奥塔的“离经叛道的马克思主义”开始，经过福柯的系谱学和德里达的解构，直到弗雷德里克·詹姆森把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话语及女性主义后现代理论重新整合为止。然后，本书转而研究方法论，随后的数篇论文讨论了“符号学的”分析（从索绪尔到后结构主义）、文本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文化人种志。由于这些章节是在案例历史和具体现场调研的层面上进行论述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将后现代主义从晦涩的学院式思辨的名声中解救出来。由于忠于批判的承诺的概念，在每一部分末尾的论文都提出警告，不要将后现代主义等同于一种浅薄的多元论（忘记了政治权力的强制），也不要以一种轻浮的“反基础主义”的名义放弃批判。

由于身处一门同源的社会科学（政治学）之中，我感到与弥漫于迪肯斯和方坦纳书里的那种激情和紧张的痛苦有一种共鸣。我希望，本书不仅将促进哲学家们与社会学家们之间的讨论，而且将促进社会科学家跨越他们狭窄的学科界限展开讨论。然而，我最深

切的希望是：本书也许能指出一条超越各种毫无成果的和教条主义的立场——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后现代主义——的道路，从而对（用福柯的词汇）在我们脚下涌动的地下动荡进行一种持续不断的反思和探索。

弗雷德·达尔迈尔
于圣母大学

目 录

序 言 弗雷德·达尔迈尔 / 1

第一章 社会科学中的后现代主义

戴维·R.迪肯斯 安德烈亚·方坦纳 / 1

第一部分 后现代的社会理论

第二章 福柯、后现代主义和社会理论 史蒂文·贝斯特 / 31

第三章 后现代主义和反基础主义 戴维·阿什利 / 65

第四章 北美的后现代文化理论 戴维·R.迪肯斯 / 94

第五章 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 桑德拉·法加尼斯 / 126

第六章 社会理论的未来和后现代批判的界限

罗伯特·J.安东尼奥 道格拉斯·凯尔纳 / 158

第二部分 后现代的研究方法

第七章 符号学和后现代主义 M.戈特迪纳 / 189

第八章 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 诺曼·K.登青 / 221

第九章 后现代时期的人种志倾向 安德烈亚·方坦纳 / 247

第十章 失败了的后现代主义 罗伯特·戈德曼 史蒂文·帕普森 / 274

中外文人名对照表 / 308

译后记 / 321

社会科学中的后现代主义

戴维·R. 迪肯斯

安德烈亚·方坦纳

对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如今在当代艺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各种理智学科中占据着一个显著的位置。然而,要获得一个有关这个术语的清晰的共同定义已经被证明是极为困难的,这不仅是因为它在多学科之间的应用,而且也因为它的多种不同的起源。后现代概念的最初实例出现在文学和艺术之中。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用法是在 1870 年前后,一个英国画家约翰·沃特金斯·查普曼的画作被描述为“后现代的”绘画,据说,该画比法国印象派更为现代(Best and Kellner 1991)。在 1934 年和 1942 年,这个概念以类似的方式被用于文学中,用来描述西班牙语诗歌的一种相关倾向(Hassan 1987)。

在一个略为不同的语境中,后现代主义在 1917 年—20 世纪 60 年代出版的一些书籍和论文中被用作一个社会历史的概念,用来描述西方文明的一个新时期(参见 Huyssen 1984; Best and Kellner 1991)。尽管这些作者在他们对新的后现代时期的评价方面有所不同,但他们一致认为后现代时期的来临将给当代社会生活带来各种深刻的后果。

例如, C. 赖特·米尔斯声称:“我们对社会 and 自我的基本定义正在被新的现实所超越”,而且“在我们的解释中有太多的东西是从中世纪向现代的巨大历史转变中派生出来的”(1959, p. 166)。

最近,后现代主义的流行用法的第三个起源可以定位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文学与文化批评家之间关于新的文学艺术风格的性质的一系列交流之中。这些批评家当中的一些人,其中最著名的是欧文·豪和哈里·莱文,哀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消逝;与此同时,其他一些人,诸如苏珊·桑塔格、莱斯利·菲德勒和伊哈布·哈桑,却赞颂新的后现代文学艺术是从沉闷的精英式美学现代主义的准则束缚之下的解放(Huyssen 1984; Hassan 1987)。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关于社会科学中的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只是在较晚的时候,即20世纪80年代才重新出现,因而主要处于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之下。在把该术语用于当代社会研究时,人类学家乔治·马库斯和迈克尔·费希尔(1986)为它提供了也许是最好的定义。他们将后现代主义定义为一种“表象的危机”,传统的准则在此处已不再适用,这意味着一种认识论上和存在论上的问题。在其中,知识与经验的现在条件与其说是在它们自身之中加以界定的,还不如说是被它们由之而来那些术语——诸如后工业的、后叙事的、后结构主义的——加以界定的(参见 Dallmayr 1989)。

本书的宗旨是要考察后现代思想中那些与社会学有关的范围广阔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弗兰克(1987)暗示说,社会学家们之所以一直迟迟不愿参与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是因为社会学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产物。其他人则用更加露骨的语言表达了这个问题。在法国理论家让·鲍德里亚看来,“社会学只能描述社会的扩张及其兴衰。它只有依靠关于社会的实证的和确定的假设才能继续存在。而社会的再吸收和内爆却逃脱了它。社会死亡的假设也就是它自己死亡的假设”(Baudrillard 1983a, p. 4)。鲍德里亚的这种末日启示的论调在近来对他的著作的社会学评论里引起了反响。登青声称,“社会学不再